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六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五期 ——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3d)

【学术争鸣】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先生（二）	高文谦
【史料辨析】《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个错位的类比	欧阳龙门
【亡灵祭坛】吴晗女儿之死	佚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学术争鸣】

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先生（二）

• 高文谦 •

（续上期）

3. “保持晚节”问题

“司马公”的文章批评我在书中“抛开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节’上作文章，硬把‘保持晚节’的心态说成‘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20）。这种指责批评错了对象，一味在“保持晚节”上做文章的并非笔者，而恰恰是周恩来本人。周从“文革”发动之初到他病重住院，一直在讲“保持晚节”的问题，这是探索“文革”期间周氏内心活动的一条线索。

所谓“保持晚节”，意指保持晚年的节操，原本并无褒贬之意，关键要看具体的内涵。“司马公”既然强调看问题要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文革”期间所谓的“保持晚节”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保持晚节”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感到自己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各级领导干部日益离心离德，于是毛泽东用这一说法给党内高级干部戴了一道紧箍咒，提醒他们要保持“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于是，“保持

晚节”一说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大行其道，成为高级干部自律互勉的信条。其含义正如周恩来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这种无论生死都要无条件效忠毛泽东的表白，与历史上皇权专制王朝的“君为臣纲”到底有多少区别呢？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党章国法，也属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问青红皂白，一味跟着毛走，对国家和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周恩来在主观上或许并不想充当帮凶，但在客观上对“文革”浩劫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明明感到不对，却强迫自己努力“紧跟”，甚至在病榻上还要表忠心，写下“要保持晚节”和“我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样的内容（21）。这不是愚忠又是什么？难道是阳奉阴违的伪君子不成？

不错，诚如“司马公”文中所说，除了周恩来之外，刘少奇其实也想保持晚节，只是保不成而已。这不恰恰说明中共政治体制和领导集团自身存在的问题吗？邓小平在“文革”后表示，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这种状况对一个执政党的领导集团来说未免有点太可悲了。刘、周、邓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一个不字，哪有一点现代政党的样子？这不是封建君臣关系又是什么？这种状况最后导致中国老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只能在血腥和恐怖中忍受苦难，一切都要等毛死后才能改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一党专政和“一个核心”这种制度上的根源之外，还有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和人们普遍存在的愚忠盲从的臣民心态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文革”结束后，人们曾痛定思痛，反省其中的惨痛教训。当年李维汉向邓小平建议要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并非无的放矢，指的就是这一点。

“司马公”的文章批评我在书中不问青红皂白，强人所不能，给读者戴上滤色眼镜，妖魔化周恩来。这种指责十分牵强，乃欲加之罪。其实，真正让读者戴上滤色眼镜的并非笔者，而是中国官方的历史读本。这些官版历史书著把凡是不利于领袖“光辉形像”的史实统统用“减法”过滤掉。与“司马公”文中的指责恰恰相反，我在书中对周恩来既没有讳过，也没有苛责，而是把他放在“文革”的历史舞台上加以审视，让人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看到了一个远比官方版本更为真实的周恩来。

比如，在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一事上，笔者在书中如实地披露了周恩来参与了对刘的诬陷定罪，这成为周在“文革”中的一大污点；同时也介绍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周与毛、江的互动中，看周是如何一步步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当时周恩来起先不愿“趟混水”，看出刘案存有不少疑点，不想急于下结论，曾一度与江青、康生顶牛，结果被毛换马；后来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周恩来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了毛整刘的帮凶。笔者在书中说明周恩来当时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而“司马公”该文所引的官版《周恩来传》则对周在刘案审查中所做的大段批示一概不提，称周是因为“不清楚”真实情况而相信了专案组制造的伪证。究竟是谁在睁眼说瞎话，向读者隐瞒真相，把“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了单线条的历史”，不是一清二楚吗？

“司马公”不同意我在书中说毛、周之间是“现代君臣关系”的看法，这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之所以在“君臣关系”前面加上“现代”两个字，是因为毛、周两人的关系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领导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不完全等同于历代王朝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两者的杂交。从现代政党的角度来看，毛、周两人虽说同属执政党领导核心中的成员，但地位并不平等，高下悬殊，毛一人独断干纲，周只能俯首听命。可是与封建王朝中皇帝和臣子的关系相比，毛、周关系又不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乃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

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主宰臣民们的精神世界，皇帝之上还有“天道”和“神权”约束着他；而毛泽东则集神权和君权于一身，他既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晚年所处的政治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泽东，从而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他虽然恪守君臣之道的分际，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这就是邓小平所谓“难于反对”的真实含义。可以说，在中共的极权制度下，周想做忠臣也是做不成的，即便是彭德怀也是一样，到头来还得违心检讨。这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选择的制度性悲剧。笔者以为，“司马公”若真是同情周恩来，就不要再充当这种政治制度的辩护士了，而是应该考虑如何釜底抽薪，推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防止周身上的悲剧再度重演。

4. 毛泽东是整陶铸的祸首

“司马公”此文还举了陶铸、贺龙的例子，指我“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追究其何以没有保护好的责任，这在法理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22）。此言纯属断章取义，故入人罪。关于陶铸、贺龙两人在“文革”中落难的来龙去脉，我在书中说得清清楚楚，责任分明。打倒陶铸最卖劲的是江青，但批陶的决定却是毛泽东做的，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一干人不过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打手。毛虽然对江青擅自把陶铸抛出来、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感到不高兴，但事后却默认了这一做法。

“司马公”文中说“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诬陷”，是本末倒置，为毛开脱。事实上，是毛决定批陶在先，“中央文革”发难于后。关于这一点，当年批陶的先锋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说得很清楚：“（1966年）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23）

毛泽东之所以对陶铸不满，是因为他充当“保皇派”，到处“灭火”，呼吁抓生产。这些事大都是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或是与周商量过而由陶铸出面去做的。这在《晚年周恩来》中介绍得很清楚，笔者既讲了周、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两人共同试图约束“文革”的狂暴；同时也指出周明哲保身的为人，听任陶铸中箭落马。陶明明是在代周受过，可是当陶落难时，周并未对他援之以手，却让陶为自己背黑锅。我在书中不过如实地陈述了这一点，这怎么能说是“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

“司马公”在该文中说，批陶会议“原本不是专为批判陶铸而开的，批判陶铸，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加在会议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员并没有落井下石，多数人以沉默对之”（24）。究竟事实真相如何，让我们还是来看看会议的参与者王力是怎么说的吧：“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随后毛又定了开“生活会”批评陶铸，“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十二月下旬开的……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25）

5. 周恩来对贺龙的始保终弃

关于贺龙遭受迫害的经过，“司马公”在文中指笔者在书中“做了手脚”，是经过“作者这样的高手来加工订制”的（26）。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中伤，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了。我在书中不过是讲了周恩来对贺龙始保终弃的经过：周本来是保贺龙的，后来见毛泽东变了卦，

他屈从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交了出来，后来还参与了给贺龙定罪的专案审查。“司马公”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否认这一点，却对我凭空指责，可是事实俱在，岂是抹黑诋毁所能遮掩过去的。

所谓“闯宫”之说，是指当年贺龙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并非应周恩来之邀，而是贺龙自己闯去的。这一说法出自官方贺龙传记组成员所写的文章。“司马公”此文抓住“闯宫”之说做文章，说这是我在“做手脚”；可是文中所引官版贺龙传记的内容却掐头去尾，连引号都不敢用，可见是何等心虚。即便如此，仍然可以从“司马公”的文章中看出，当时贺龙是不请自来，而不是象“文革”结束后官方曾大加渲染的那样，是周主动请来的。

“司马公”文中还引用杨成武的回忆，企图把贺龙遭受迫害说成是“杨余傅事件”在之后。事实上，贺龙失去人身自由，就发生在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把他请出中南海西花厅的那一天，当时名为送贺龙到西山“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对贺龙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67年9月，在杨成武被打倒之前半年，贺龙就已被正式立案审查。贺龙的政治处境，在杨成武主管期间与后来黄永胜接手后相比，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专案审查的对象，至多只是生活上照顾得好一些而已。

不仅如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初，周恩来还亲自兼任过组长（27）。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人员虽几经变动，但周恩来一直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的身份掌管指导对贺龙的审查，作过多次批示。贺龙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团固然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在书中讲得很清楚，但周恩来也是参与者，难脱干系。在林、周两人上面，还有毛泽东，整贺是他拍的板；没有毛的同意，林彪即使想倒贺，也是办不到的。

对此，周恩来心里有愧，知道自己是欠了帐的，对不起贺龙及其家人。所以在“林彪事件”后，他立即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找回来，后来又抱病坚持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先后鞠了七个躬，向贺龙的遗像谢罪。基于上述史实，我在书中说周对贺龙之死“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究竟是属于公允持平之论，抑或如“司马公”文中所说，是“放过迫害者不去理论，却缠住保护者”，读者自可明察。

“司马公”“发现”《晚年周恩来》书中关于贺龙冤案“有一段没有档案记载，全部依据的是大陆出版物”，由此推断“不是大陆没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倾向和写作目的的材料”（28）。这完全是生拉硬扯，强作解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年曾看过一部分“贺龙专案”的材料，只是写书时这些材料不在手边，不得不用一些公开史料加以替代。这部分内容，日后修订全书时会补上的。

“司马公”此文还批评书中记述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时引用了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此外，《晚年周恩来》出版后，也有其他评论者提出类似问题，认为书中引用了权延赤等人的纪实作品，影响了内容的可靠性。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引用这些材料，而在于采用时是否经过辨析，提供了事实真相，因为其中有些个人的回忆材料恰恰能弥补文献档案的不足，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我在书中使用这些材料时是作过比较辨别的，对照所掌握的文献档案有所取舍，并非简单照收。

比如，李志绥的回忆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有不少近距离独到的观察是别人取代不了的，像“7·29大会”就是一例。“司马公”文中屡屡引用的官版领袖人物传记也采用了不少汪东兴的回忆。已有不少论者对汪的回忆文字提出质疑，认为汪在“文革”中卷入太深，为了给自己开脱而处处替毛遮掩，有明显的不实之处。按照“司马公”文中的逻辑，官版领袖人物传记引用汪东兴的回忆，其内容的可靠性不是也值得怀疑吗？

6. 毛泽东是刘少奇冤案的主谋

《晚年周恩来》叙述了刘少奇冤案的来龙去脉，“司马公”此文对此的反驳苍白无力，支吾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一望而知，实在是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书中把审理刘案的经过交待得一清二楚，指出毛泽东是主谋，江青是第一线“攻坚”的指挥，周恩来是被拉下水的，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司马公”既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反驳，又不敢面对书中披露出来的历史文献档案，只好故技重施，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江青，让她背黑锅。

为了给毛泽东开脱，“司马公”在文中对毛的罪责轻描淡写，强调“刘少奇专案控制在江青等人手中”，毛只是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是“用人严重失察”；然后笔锋一转，大谈毛是如何为刘说好话的，如表示刘的检讨“写得很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刘、邓要准许革命”，还要选刘、邓当中央委员等，用这种“障眼法”来掩盖历史真相——毛泽东才是制造刘少奇冤案的罪魁祸首。其实，“司马公”玩弄的这套把戏不但不能为毛开脱罪责，反而欲盖弥彰，让人们更加看清了毛的真实面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关爱，为什么又出尔反尔，置刘于死地？这难道是用“用人失察”所能解释得了的吗？刘少奇这样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江青岂能一手遮天置其于死地？事实上，江青不过是奉命咬人的一条狗，毛才是幕后的真正主使，不仅江青负责刘案的审查是毛亲自指定的，而且江青伪造的刘案罪证，最后也是毛拍板定的案。

在事实面前，“司马公”推翻不了毛泽东是制造刘少奇冤案的主谋这一结论，只好另想办法。它一方面替官方开空头支票，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的档案材料的公布”将会印证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无中生有，指我说毛是“迫害狂”（29）。这又是在凭空捏造。遍查《晚年周恩来》全书，并没有“迫害狂”三个字。像这样栽赃的例子，“司马公”文中不止一处，这究竟是在治史还是在造伪呢？

7. 批毛与重评“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悬而未决。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件本身扑朔迷离，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统帅”竟然在一夜之间仓皇出走，成为死在异国他乡的“卖国贼”；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官方给事件的定性至今还维持当年的说法，出于政治需要，让林彪和江青两人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背黑锅。其中加给林彪的罪名，无论是“抢班夺权”，还是谋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实之处，或缺少证据，存在许多漏洞和疑点，主要结论难以成立。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彻底批毛的问题。只有把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才能廓清历史真相，把问题说清楚。这是公正评价“林彪事件”的前提。笔者在书中根据所掌握的史料交待了毛、林交恶的来龙去脉，披露了若干重要史实，戳穿了以往官方的说法。“司马公”文中指我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抑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还振振有辞地质问：“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30）”

事实上，如果说谁有什么“预设意图”的话，倒是“司马公”此文通篇都是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服务，替中共领袖人物百般遮掩。例如，该文在“林彪与文革”这一段里细数林彪的罪行，却极力回避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只能哄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又如，该文指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泽东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再如，该文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林彪却大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一贯英明”。笔者不禁要问，当时毛的“检讨”是由衷之言吗？

林彪作如此讲话之后，毛不是带头鼓掌、大加赞扬吗？

还有“司马公”文中说林彪在1966年的“5·18讲话”中大谈政变问题，那为何扭扭捏捏，不敢说明当时指定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带头发言的就是毛泽东？在林彪作此讲话之前，毛本人大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渲染“千百万人头落地”，并调兵遣将，进行防“政变”的准备，究竟谁才是始作俑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的罪过难道大过毛泽东不成？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被指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过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泽东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出走、死于非命了。笔者在书中对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权术的为人作了充分揭露。不少读者向笔者表示，书中写得最传神的人物就是毛，揭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他们说，且不说毛祸国殃民，给国家和民族造的孽，就说他嗜权如命、整人不择手段的为人，也实在是太可怕了；毛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这些年来一起打江山的战友都不肯放过，往死里整，单凭这一点，毛就不配被供奉在纪念堂里。

毛泽东在1970年于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玩弄权术、出尔反尔的典型例子。事实上，林彪在这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并非如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的“突然袭击”，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然而，事后毛却不认帐，在倒林的南巡讲话中宣称“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我在书中引述对吴法宪的采访，指出：“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31）”

“司马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风波的起因上说谎，那么以往加给林彪的罪名就站不住脚了，对毛、林交恶的是非真相也要重新评说了。于是，“司马公”在文中试图拿笔者书中资料的来源做文章，指吴法宪的回忆是“三传手”“真实性大打折扣”（32）。对吴法宪的这个采访记录，官版《周恩来传》多次引用过。“司马公”的不老实之处在于，它对官版《周恩来传》引用吴法宪的回忆并无异议；而当笔者引用同一史料时，它却站出来怀疑该史料的真实性。在“司马公”看来，似乎一件史料中符合官方政治需要的内容就自然是来源可靠的，而史料中官方不喜欢的内容就一律属于“出处可疑”。这种“双重标准”不正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的上述回忆虽非原始档案，但也不是孤证，其中关于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一节，可从其他档案中得到印证。例如，1971年“批陈整风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带领黄永胜、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在这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林彪转弯抹角地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辩护，说自己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顺口而出，放了炮”，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33）。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是奉毛泽东之命去的，回去后要向毛汇报谈话情况；而且同去的李德生、纪登奎又是毛的红人，因此林彪不大可能当面说谎，他当时所说的“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这份谈话记录就存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室里。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引用了这次谈话内容，其中《周恩来年谱》还特别指出，“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司马公”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却故意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奉命为文者遇到难言之隐的问题常常就是这样行事的。

在所谓林彪“谋反”的问题上，“司马公”此文指《晚年周恩来》“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自从林氏父子决心用武装政变方式向毛摊牌起，问题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再也不是党内分歧，而是一场粉碎阴谋集团的残酷斗争”（34）。这里，“司马公”为了替毛泽东辩解，

简直到了信口开河、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的地步。就算林彪父子准备“谋反”，根据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官方披露出来的文献史料的说法，毛泽东是“9·13事件”林彪死后才从“揭发材料”中了解到的，此前毛并未掌握确凿事实，顶多是觉出一点蛛丝马迹。

既然如此，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以莫须有之疑，对林彪步步紧逼，先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又是“南巡讲话”，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散布对林彪的不满，这些做法难道都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之举？这样做符合中共自己的组织原则吗？难道党的主席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毛在南巡中到处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是毛自己对林彪不满，为什么不当面与林彪谈谈，反而避而不见，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问题，而是跑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毛如此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司马公”为毛泽东的辩解其实令自己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或是承认毛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擅自在下面制造倒林舆论，是一种目无党纪的非组织活动；或是承认这个党原本就是封建帮会或“毛家祠堂”，一切要由老大了说了算。两者必居其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毛都应该被揭露并遭到谴责。弄清楚这一点后，林彪“谋反”、“叛逃”的问题，就容易说清楚了。

三、周恩来晚年遭整治的真相

1. 毛是阻挠延误周治病的祸首

笔者在书中介绍了周恩来患癌症后治病的经过，指出毛泽东的“四条指示”以及后来通过汪东兴向“周恩来医疗组”下达的指令，延误了治疗时机，所以毛是导致周恩来的病最后无可挽救的祸首。对此，“司马公”在文中又拿出拒不认账的看家本领，推说毛的“四条指示”“没有档案作证”，“无缘得见作者所说的‘座谈会记录’”（35）；对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有关周恩来疾病治疗问题的指令更是装聋作哑，连提都不敢提，可见十足的心虚。

然而，白纸黑字所载的史料岂是赖账所能赖掉的。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是周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揭发出来的。这次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0年11月在毛家湾召开，与会的有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逢先知先生。其实，“司马公”完全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对自己的公然撒谎抵赖不免感到心虚，于是在文中笔锋一转，又为毛泽东的“四条指示”逐条辩解起来，同时渲染毛对周的治疗工作如何“关心”，竭力为毛开脱。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既非矢口抵赖所能抹煞，也非混淆事实、刻意狡辩就能遮掩的。“司马公”的辩解其实是越抹越黑，正应了“欲盖弥彰”一语。

在1972年5月的一次尿常规例行检查中，医生在周恩来的尿样中发现有几个红血球，从而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还属于早期发现。医疗专家随即向中央写了报告，陈明利害，根据膀胱癌的特点，主张尽快动手术，以绝后患。毛泽东通过汪东兴下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当时医疗组的专家们深知治疗时机的紧迫性，对毛的决定很不理解，要直接写信给毛，被汪东兴拦阻。根据医疗组“周恩来补充病历记录”记载，汪要他们先“稳住”，强调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36）。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对周恩来癌症的检查治疗工作便耽搁下来，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次年3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这时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做电灼手术（37）。最后

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过时机，癌细胞已经扩散，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这便是毛延误治疗的大体经过。

“司马公”文中竭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不敢谈及上述周恩来的癌症诊治被延误的整个过程，回避了其中的要害问题，即周所患的是早期膀胱癌，可以用手术根治。毛本人虽然不懂医学，但医疗组专家们给中央的报告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毛拒绝听取医疗组专家们的意见，下令封锁病情，不许检查和手术，他的“四条指示”的核心就是不准开刀根治，其它三条都服从于此，而且一拖就是9个月。结果，本来只能在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个别表层癌变细胞迅速增长，侵入深层组织，继而扩散到全身重要脏器。由于诊治被毛泽东阻挠延误，周的癌症发展成晚期，后来施行的电灼术纵然可以减少一些病人的痛苦，但已不能挽救周的生命了。

“司马公”文中对毛泽东“不要开刀”这一指示的辩解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意思”〔38〕，为了自圆其说，还借汪东兴之口搬出陈毅、谢富治两人开刀不治而死的例子。所谓“保守疗法”是针对癌细胞广泛转移的晚期病人，因已无法去除癌病灶，为减少痛苦而采取的办法。此疗法只是权宜之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与能挽救癌症早期患者生命的手术治疗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陈毅、谢富治两人所患癌症均为晚期，已经扩散，采取“保守疗法”是不得已之举；周恩来的病情确诊时则与他们完全不同，属于早期发现，而癌变细胞又发生在膀胱表层，容易切除根治。“司马公”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当时，毛泽东为了阻止对周恩来实施手术治疗，下令对周氏夫妇封锁病情，从而让周失去了手术根治的宝贵时机而走上死亡之路。“司马公”把毛下令隐瞒病情说成是“人之常情”，请问自古至今有这种见死不救的“人之常情”吗？再者，对周恩来本人隐瞒病情或许情有可原，难道对邓颖超这位病人家属隐瞒病情，这也属于“人之常情”吗？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公”又在有意误导读者了。毛在此事上的阴暗心理，岂是“司马公”文中刻意开脱所能圆过来的！

毛泽东“四条指示”中的第二条是“不要检查”。“司马公”在文中以“此语不得其解”而一笔带过〔39〕。毛泽东的这句话语意明明十分清楚，“司马公”怎么会“不得其解”呢？它在这一要害问题上想打马虎眼混过去，是因为这条指示乃毛泽东居心叵测的一个铁证。“不要开刀”，或许还可以用“保守疗法”一说来开脱；可是对“不要检查”这道指令，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理由了。即便是采取保守治疗，也必须进行必要的检查，并根据病情的发展状况实施相应的治疗措施。可是根据毛泽东的指令，连膀胱镜检查都不准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治疗呢？实际上这道指令的真实含义是“不要治疗”，毛不可告人之居心昭然若揭，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好意”来解释的。

自周恩来被确诊患早期膀胱癌后，医疗组的专家们根据毛的指令9个月内未对周的病况做进一步检查，因为一做膀胱镜检查就无法再对周隐瞒病情了。直到1973年2月周排出大量血尿，把马桶里的水都染红了，医疗组才不得不对周恩来夫妇告以实情。根据医疗组的“周恩来补充病历记录”记载，当医疗组找汪东兴反映周恩来尿血时，汪又把毛泽东搬出来，阻止对周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汪东兴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最后还是叶剑英出面陈情，毛才批准做膀胱镜检查，但仍指令只准做检查，不准做电灼术。这种有悖常理的决定，让医疗组感到十分为难，不得不去找邓颖超商量，希望借助病人家属的意见，在检查中发现病灶点时能变通处理。吴阶平2003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谈到了医疗组冒着风险和压力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暗中抗命的情况。他说：“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40〕。吴在回述这段往事时，主持人注意到，他“整个

人是颤抖的”。对堂堂一国总理的治疗，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这难道还不反常吗？

在这一史实面前，“司马公”居然在文中把电灼手术的成功归于毛泽东“不要开刀”的决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欺骗世人。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本人下令不准在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的同时做电灼术治疗，而吴阶平等医疗组专家偷偷使用电灼术治疗属于违抗毛泽东的命令，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至今提起来还后怕。显然，毛泽东非但不是帮助周恩来治病的有功之人，相反却是一再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司马公”不惜捏造谎言，硬往毛泽东脸上贴金，这是它弄虚作假，蒙骗读者的又一例证。

2. 关于“伍豪事件”

“司马公”此文指我在书中叙述“伍豪事件”时，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脚”，以此来勾连历史过程，故弄玄虚，误导读者，并进而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指我因曾长期在大陆高层机关工作，养成了“双重性格”和“晦暗心理”（41），以小人之心度领袖之腹。这种指责显然超出了正常讨论问题的范围，完全是恶意中伤。既然该文作者谈到中共政治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笔者愿意借此机会稍作分析。

“司马公”假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如此说法实在是做作可笑。凡1949年之后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无不对毛时代的血腥恐怖有切身感受，没有人敢说真话。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真实的写照。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紧箍咒，而说假话则一直是中共党文化的一大特色。当局对“六四镇压”那样违背天理的事情都可以撒弥天大谎，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目前中国社会弄虚作假成风，以致于发展到贩卖假酒、假药，危害整个社会，其根源就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司马公”此文想否认周恩来被扭曲的双重人格，结果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之中。连中共官方都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的话”、做了不少“违心的事”，这不是双重人格又是什么？莫非当年周恩来在大庭广众之下颂扬“文革”、吹捧江青的那些话，全都是真心话不成？倘若如此，周恩来与“文革派”岂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恩来尚且人格扭曲，要说“违心的话”，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其实，“司马公”们又焉能不说假话，不然他们能在官方史家的位子上混得下去吗？

“司马公”文中之所以对笔者作人身攻击，是因为我在书中叙述历史过程和事实真相的同时，揭露了毛泽东一贯玩弄权谋、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为人，把这位“伟大领袖”的政治品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司马公”这样官方史学的御用文人来说，不啻是被挖了“祖坟”，其尴尬和恼火可想而知。可是，“司马公”又实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驳倒书中论点，只好使出中共党文化中惯用的人身攻击伎俩，其实这样恰恰暴露出它理屈词穷的窘相。

对历史事实作深入的分析和合理的解释，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评价一家之言，关键要看它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够自圆其说。中国官方组织人马对《晚年周恩来》大张挞伐，无非是想把对历史的解释权独家垄断起来，好让民众继续相信官方编造的种种天方夜谭。“司马公”此文就处处表现出这种心态，执意要别人都统一到官方的口径之下，否则就斥之为“歪曲篡改历史”，天下还有比这更霸道的吗？

“伍豪启事”是周恩来晚年的一大心病，也是考察毛、周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司马公”自然深知这点，不过它为了维护毛、周之间“亲密无间”的神话，在它的文章中硬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而把毛泽东与此事的关系摘得干干净净，宣称毛“严辞制止”，还由此断言说，“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是和毛泽东对他

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42〕。

关于毛、周关系的真实状况，从我在书中一开始引用的那封周恩来在病榻上写给毛泽东的请罪信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信中周辞卑言重，诚惶诚恐，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哪里看得见一点“亲密无间”的样子？这种“臣罪该万死，皇上圣明”之类的央告表白，与“司马公”文中所称毛对周“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实在是天差地远。事实上，“伍豪事件”的由来，并非如“司马公”文中所言，乃“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了斗倒刘少奇、在全国发动“抓叛徒”战役中的意外收获。当年举报这件事的是周荣鑫之女，而周荣鑫则是周恩来的直接属下一一国务院秘书长；她写信给江青，要求直接向毛报告这件事。毛当时并没有马上还周恩来一个清白，而是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如此，这件事就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

“司马公”在其文章中辩称，毛泽东上述批示的意思是对“伍豪启事”“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这完全是一种诡辩，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当时正是周恩来处境困难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舆论甚嚣尘上，毛明明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又看过周本人的申述，却故意不置可否，让周整日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出事”，甚至连牙具都准备好了。这哪有一点“信任、支持”的影子，毛这样做不是把周玩弄于股掌之上又是什么？直到1968年1月，毛才对“伍豪启事”表了态，那已是时过境迁以后的事了，不过是以此来安抚周为他收拾“文革”的烂摊子。

即便如此，“伍豪事件”并未真正了结，仍然是周恩来的一大心病。笔者在书中说，周的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这是他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此一结论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也是有出处的。“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周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自揭历史老底的同时，再度把“伍豪启事”问题翻出来，让周恩来向与会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一说明。当周恩来病重后，毛又发动“评《水浒》”、批“投降派”，影射周恩来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周恩来动手术之前，在已经打了麻醉药的情况下，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让邓颖超向毛报告。

邓颖超在1989年4月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对此，身为官方史家的“司马公”无疑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它却装聋作哑，还反诬一口，说这是笔者的“主观推断”。不仅如此，“司马公”在文中还倒打一耙，指我在书中未提及毛泽东在1968年1月对“伍豪启事”的表态，说“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43〕。这又是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关于这一条，笔者在书中第244页不仅明确提及，而且还注明了出处，说明这是毛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来信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司马公”却硬说没有。如此撒谎，这样的官方史家还有什么可以让人相信的呢？

3. 关于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73年底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周恩来晚年在政治上遭受的一场最大的劫难。笔者在书中详述了这件事的原委，揭露了令中国官方极为尴尬的事实真相，让人们看到中共两代领导核心在整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是整个事情的策划者和指挥者，邓小平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与会者一齐上阵，把“人民的好总理”斗得“不亦乐乎”（毛泽东语），中共政治的黑暗和丑恶由此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司马公”此文花了不少笔墨为毛泽东辩解，把这件事的责任一股脑推到江青一干人头上，说“幸而毛泽

东出面解围，为周讲公道话，使江青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这明明是“司马公”在颠倒黑白，本末倒置，它在文中却倒打一耙，反指《晚年周恩来》“把倒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想把水搅浑”（44）。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是“司马公”文中的一大特色，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无所不用其极。

究竟是我把整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还是毛本来就是祸首，应该让事实来说话。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这既源于毛对周批“极左”而产生的不满，也因为毛对西方舆论渲染“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事情的爆发点是“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简报事件”。毛泽东小题大做，对周报送的这份简报大发雷霆，乃至用了“放屁一通”这样的粗话。

接着，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又找“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王洪文谈话，矛头直指周恩来，语中露出杀气，甚至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到“上贼船”和“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搞修正主义”一语是毛在发动“文革”倒刘时的用语，而“上贼船”的提法则是毛在制造倒林舆论时甩的“石头”。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海容、唐闻生在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对“上贼船”做了解释：毛当时用“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冠华、姬鹏飞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为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了调子。“司马公”在文章中提到江青等人在会上批周的言论，如扣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指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等；其实按照毛泽东7月4日谈话的调子来衡量，江青等人的发言并未出格，至多是讲得更直截了当罢了。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正是从毛讲话中“搞修正主义”（指毛时代打击刘少奇的所谓“第九次路线斗争”）、“上贼船”（指毛时代打击林彪的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伸出来的，而“错误路线的头子”不过是“贼船老板”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事实上，那次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严厉的提法，并不是江青指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一类的话，那毕竟还是属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比这更加耸人听闻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所说的，指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45）。这无异于指周是“卖国贼”。据当年列席会议的乔冠华回忆，听了担任毛联络员的海容、唐闻生传达毛的话后，简直“毛骨悚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江青一干人大批周的“投降卖国”，就是由此而来的。

“司马公”为了给毛泽东开脱，竭力淡化毛上述谈话的份量，还搬出让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作政治报告为例，称“周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此殊荣”，以此来渲染毛对周的“信任”。这实在是牵强附会，误导不明真相的读者。其实，毛当时已经做了换马的部署，选择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不过由于王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台，只好让周恩来作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按照惯例，在党代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是毛的接班人，“八大”是刘少奇，“九大”是林彪；而在“十大”上作政治报告的周恩来却根本没有接班人的政治地位，与其说作这样一次报告是什么“殊荣”，还不如说是让周权且支应门面。“十大”后，王洪文接班的态势已十分明显，凡是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都由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联名。就在起草这个“十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地授意张春桥把7月4日批周谈话中的结论（即“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中，暗中留下伏笔。这说明，在毛的心目中，批周这件事并未了结，还要再继续做文章。

作为官方史家的“司马公”，惯于把政治人物脸谱化，它把毛泽东涂成“红脸”，把江青则画成“黑脸”，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毛、江两人在“文革”中合开的“夫妻店”所干的恶事，全是“老板娘”一人所为，与“大掌柜”无关。事实上，江青行事或许有操之过急、掌握分寸不当的地方，但绝对是“奉旨”行事，她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江青不过是前台的打手而已。此外，由于毛经常玩弄两面手法，先打后拉，到头来只好让江青为他背黑锅。这次批周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就是如此。“司马公”完全清楚这些情况，可是却刻意回避，宣传什么周恩来每每涉险过关，是“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但事实真相是，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工作中的一点纰漏，大张挞伐，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亲自给周戴上“卖国投降”的帽子，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信任”的影子？难道这就是“司马公”竭力渲染的毛、周之间的“亲密合作”吗？至于“司马公”文中说，“毛泽东出面解围，为周讲了公道话”，那不过是毛在玩弄一打一拉的手法而已。要不然，毛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怎么会有“他做脸，我们做屁股”这样的牢骚呢？

4. 关于邓小平的复出

“司马公”此文把“邓小平复出”专列了一个小标题，指责笔者在书中“把邓小平的复出，描写成一种罪恶”（46）。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为了给我抹黑，竟然到了任意栽赃的地步。遍查《晚年周恩来》一书，笔者从来没有用“罪恶”这样的意思来描述邓的复出。“司马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笔者在书中梳理了毛、邓之间长达40年的合作关系，揭了邓小平的老底，指出邓和毛的历史渊源极深，是毛派的一员大将，多年来一直受到毛的精心培养，建国后更成为毛手中挟制对手的一张王牌。与此同时，书中还纠正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觉，指出在幕后推动邓复出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邓小平复出”是毛在“林彪事件”后政治上挟制周恩来的一着棋。

更让官方恼火的是，我在书中揭露了邓小平复出伊始，就在批周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替毛泽东说出了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以便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邓是中共第二代掌门人，在政治上一直以周恩来的“传人”自居。书中披露的史实让人们看到邓的真实面目，而且凸显了中共政治的黑暗和人性被制度扭曲的一面——在中共的权力场中，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即便象邓小平这样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到的人物也不能逃脱；一旦复出，他就投入了对自己“兄长”（邓小平对他人称周恩来为自己的“兄长”）的批斗。这种揭露自然让官方极为尴尬，可是又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反驳，于是“司马公”只好偷天换日，把毛让邓复出和邓重新得到毛的重用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误导读者。

邓小平从复出到重获毛泽东的信任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生怕有人翻“文革”的案。邓小平在复出时虽然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却不能完全打消毛的疑虑，他对邓还在观察之中。这从邓小平复出后的职务安排也能看出，邓复出后并未马上获得重用，只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当时决定“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也未被选入政治局，而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恰恰是因为邓小平在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表现让毛泽东感到满意，批周会议之后邓才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邓小平批判周恩来的表现与重获毛泽东信任和重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司马公”文中否认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周恩来所做的“诛心之论”，用抵赖的手法，在史料的出处上做文章，以此给我加上“作假”的罪名。“司马公”在文中指称，书中“理应拿出像样的档案材料作为确凿的证据，而作者能够拿出来的，只有其所称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如今，纪登奎已经作古，他当时如何说的，恐怕也成了问题”（47）。关于这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档案材料，笔者在书中引述邓颖超与“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记录指出，“文革”结束后，叶剑英、邓颖超两人向中央写报告，经华国锋批准，已将当年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部记录烧毁。作为官方史家，“司马公”明知中共元老叶剑英、邓颖超才是销毁这次会议档案的责任者，却故意将此节掩过不提，试图造成笔者无法提供原始档案材料的假象。

事实上，《晚年周恩来》中援引对纪登奎的采访，虽说不是原始档案，却是亲历者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不是孤证，很多外交部的老人都知道邓小平当年在政治局批周会议上对周恩来的“诛心之论”。当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外交系统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内容时，外交部的老干部们就对此议论纷纷，感到“四人帮”攻击总理并不奇怪，可邓小平也这样做，就不好理解了。当年我在撰写官方的《周恩来年谱》时，专门调查了解有关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和我谈到了这一点。“司马公”此文想通过否认纪登奎回忆的可信性来为邓小平遮掩，结果顾此失彼，自打耳光。就在“司马公”文中引为权威的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中，曾多处引用了纪登奎的谈话记录。不知“司马公”是否也打算把大陆官方领袖人物传记归为“作假”？

“司马公”文中还搬出邓小平女儿邓榕在自己的书中所写内容来为邓小平辩解，可是又露了馅，越抹越黑。邓榕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当年确实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批周的发言。邓榕写道：“发言一开始，他（邓）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48）”虽然邓榕的记述对其父当年批周的内容语焉不详，但邓小平参与了批周这件事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印证了《晚年周恩来》书中所述并非妄言。

顺便一提的是，关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我在书中纠正了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刻意制造的周、邓两人“亲密无间”的说法，指出他们之间其实是合而不同、同而不党，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书中对邓榕所说的周支持邓与毛硬顶的做法提出了置疑，因为这不符合周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最近，中国有杂志发表了采访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和高振普而写成的文章，披露了在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周不同意邓与毛硬顶，劝邓“你就不能忍一忍”的情节（49）。这印证了我在书中对邓榕的置疑。邓榕此书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下写成的，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其中有不少不实之处，这便是一例。

5. “批林批孔批周公”

笔者在书中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指出这是其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是现实中的靶子，把这两种情结融会贯通起来。当年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影射史学”，指孔骂周便是由此而来。书中还揭露了“批林批孔”运动是毛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江是前台领军人物，毛是幕后主使。

“司马公”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说我“搞了倒果为因的手脚”，但辩白却苍白无力，摆了一大堆众所周知的材料，可还是让人不知所云。“司马公”给“批林批孔”运动“定了个框框”，所有的事情都让江青背黑锅，而把毛泽东摘得一干二净。“司马公”避而不谈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毛扮演的角色和应负的责任，却大谈毛如何“批评”江青，好像一切都是江青在捣鬼。实际上，“批林批孔”运动从头到尾就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从提出“评法批儒”、对江青面授机宜，到大造舆论、布置《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再到部署发动，批准江青、王洪文两人的联名报告，将清华、北大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无一不是毛在幕后指挥。中国当年屡屡宣传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并非虚词。

毛泽东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评过江青，制止了江青批“走后门”的搞法，那是因为江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从“司马公”文中列举的毛批江青的那些话来看，与其说毛是在“批评”，还不如说是小骂大支持，恨铁不成钢。不然的话，江青怎么会有恃无恐，屡屡“另搞一套”呢？事实上，毛在“文革”中一直是把江青当枪使的，总是让她打头阵。这就是为什么毛在“敲打”江青的时候，也总是不忘表扬江青批刘、批林“斗争坚决”的原因。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合演“批林批孔”这出大戏中的“戏

外戏”罢了。

“司马公”为了美化维护毛泽东的形像，完全否认“批林批孔”运动批“周公”的实质，居然把当年揭批“四人帮”时就已定案的事也推翻了。在“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借古讽今，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若非毛的默许纵容，姚文元之流岂敢如此露骨地把矛盾指向周恩来？白纸黑字俱在，又岂是“司马公”刻意遮掩所能抹掉的？

笔者在书中指出，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党内翻案复辟势力的一杆旗子。“司马公”文中指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称毛“对周在政治上还是放心的”（50）。“司马公”为了给毛开脱，连起码的史实和逻辑都不讲了。毛晚年的一大心病，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的案。“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幌子，试图暗中扭转“文革”的方向。周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当然逃不过毛的法眼。毛本来就是个疑心极重的人，没事还常疑神疑鬼，何况批“极左”确有否定“文革”之嫌，“文革”乃毛的命根子，毛岂会善罢甘休？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就是要从政治上解决“反复辟”的问题。“司马公”此文一方面说周恩来批“极左”“用心良苦”，另一方面又否认毛认为周批“极左”是暗中翻“文革”的案，实在是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

毛泽东明明是批周的指挥者和后台老板，“司马公”为了替毛辩解开脱，一方面渲染毛对江青一千人的批评，声称毛“采取了非常之举”，可摆出来的论据却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样一类不痛不痒的表态；另一方面，“司马公”又淡化毛泽东关于“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谈话，声称毛的“评《水浒》”谈话“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含义”，“完全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私人交谈”，用毛“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一类的说法，试图让读者相信，毛本无批周之意图（51）。事实上，毛泽东有关“评《水浒》”的谈话几小时之后，姚文元就立刻写了一份报告，称毛对《水浒》的评论具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而毛本人马上就批准了姚的报告，两三天内就将此报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转发全国。毛这样做究竟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假如毛“评《水浒》”、批“投降派”真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为什么周恩来进入手术室之前大喊“我不是投降派”呢？如果仅仅是江青、姚文元一千人鼓噪，没有毛的意思，周会如此介意吗？

6.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病重和逝世前后，毛泽东对周的真实态度是最让中国官方难堪的地方。我在书中用大量史实揭露了毛对周冷漠无情的态度。很多读者给我来信，表示了对毛的愤慨。于是，“司马公”就在其文章中专列一节为毛泽东辩解。文中指我对周恩来之死前后“浓彩重墨，做足了文章”，可是又无法从正面批驳，只好拐弯抹角，夹七夹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关于周恩来治病的问题，上面已经谈过。我在书中说，“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做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这完全是真实情况。“司马公”当然清楚这一点，它为毛辩解的手法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大谈周住院前繁忙的国事活动，然后挑出周恩来对医疗组的一个批注，掐头去尾地引用，试图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周可以为自己的治病问题做主。“司马公”这是在避重就轻，迷人眼目。当年周恩来的医疗组长吴阶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当时周恩来本人是想做手术的，可是医疗组却不得不服从毛泽东的“不准开刀”的决定，结果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一切无可挽回。在周恩来能否住院的问题上，医疗组也遇到干扰，那时张春桥出面阻拦，强调毛泽东所谓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的意图，医疗组干着急却没有办法。这些情形我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关周恩来住院治疗被一再拖延这一点，当年我在中国编写官版《周恩来年谱》时就感到

蹊跷，周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当时无法畅所欲言，而且发表文章时要送审，必须符合上面的口径。我1986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奉命之作，发表前经过邓力群审阅，并按照他的意见做了修改。“司马公”此文称，笔者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与在《晚年周恩来》书中的说法“自相矛盾”，企图借此否定令当局难堪的史实。“司马公”如此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低估了读者的判断能力。当年我身处官方文献研究机构，戴着“紧箍咒”，所言所述往住身不由己；如今则是自由身，说话做事不必再有所顾忌，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自然不必再作奉命文字。究竟哪种情况下的著述更可信，相信读者自会判明。

在周恩来治丧的问题上，“司马公”此文故意避谈毛泽东违忤党心民意，下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也回避了当时政治局大多数人希望毛能参加追悼会的事实，却搬出毛对周的丧事报告批示“同意”一事做文章，指责我在书中没有提这件事，“借用他人之口”说毛“只是划了一个圈”。从中共的官场运作模式看，在送审文件自己的名字上“划圈”和批示“同意”两者并没有多少差别，“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大部分中央文件都是用所谓的“圈阅”方式批准。因此，毛对周的丧事报告写了“同意”一词还是“划圈”批准，其实无关紧要。问题的要害在于，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还压制党内外自发的悼周活动。“司马公”舍此来纠缠枝节问题，是避重就轻，故意转移视线。

此外，“司马公”所谓的“借用他人之口”，这个“他人”指的是张玉凤，因为我在书中引用了她的回忆文章中有关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治丧报告的情况。“司马公”之所以不敢指名道姓，是因为心里有鬼，张玉凤虽然也是奉命为毛辩解，但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含蓄地表达了她对毛当时做法的不安。“司马公”自然不希望读者注意到这点，因为这样一来，它的治学态度就露了馅。该文前面还大段引用张玉凤的文章批驳笔者，后面又因为张玉凤的回忆不符合它的说辞，就翻脸不认人。一个作者翻云覆雨竟至于此，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结语

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笔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尽绵薄之力，把“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晚年周恩来》一书无非是一个尝试。而“司马公”奉命为文，竭尽歪曲诋毁之能事，也无非是要代表官方继续垄断中国现代史的解释权，阻止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笔者与“司马公”争论的焦点，就是到底要不要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正是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笔者与“司马公”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对其阐释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难苟同。

“司马公”在文章中把毛泽东描绘成“理想社会的追求者”。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推行“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是为了与苏联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闯下大祸后毛又拒不认错，炮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制造个人崇拜，为发动“文革”做舆论准备；当他发现党内外反对声浪日益强大时，担心遭到清算，便先发制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幌子，行整肃反对势力之实。这种把个人名位置于国家民族之上，为一己之私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长期浩劫的行为，如果不是一种罪恶的话，也绝非“好心”办错事。毛时代无数屈死的冤魂用殷红的血字书写的历史，岂是一句“理想社会的追求者”所能遮掩过去的！

“司马公”撰文的目的是按照中国官方的政治需要来图解历史，修补领袖神话，维护“一个核心”的政治体制。该文作者采用倒打一耙之手法，指我在书中“照预先设定的框框来图解历史”，把毛泽东说成是“文革”时期“左右两派的居中驾驭者”（52），似乎毛在“文革”中弄权耍阴谋的种种行径都是我杜撰出来的。在“司马公”笔下，血腥、狂暴、充满罪恶的“文革”变成了纯粹的“理念之争”，从中央到地方激烈的派别争斗通通不见了。为了给毛辩护，“司马公”居然编出这样美妙动听的天方夜谭，哪有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呢？

历史早已判明，毛泽东是“文革”浩劫的策划者、发动者和指挥者，如果说中共党内曾经存在过包括“四人帮”在内的“文革派”，那么毛泽东就是最大的“文革派”。“文革”结束后，中国民众中早就有“五人帮”之说，即指毛是“四人帮”的后台老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在书中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和江青等“文革”派之间的这种关系。同时，在记述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时，笔者并不否认其乌托邦狂想和追求公正、纯洁的社会主义，确有几分理想主义的成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毛的这种理想主义并不那么高尚，正如前面所说的，背后还是个人一己之私欲在作祟。

“司马公”文中指笔者写《晚年周恩来》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并由此推论说“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它还大言不惭地谈什么“史德”的问题，诌出“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这样半文不白的句子来（53）。

关于写作《晚年周恩来》的缘起，笔者在书中后记里说得很清楚，15年前的“六四”血腥镇压改变了我的命运。中共当政者为了一党之私利，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机枪，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大开杀戒，干出了连当年日本侵略军进入北京城时都没有敢做的事情。与“司马公”们不同，我的良知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种制度，装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一样，继续心安理得地充当官方的御用文人。与这样的制度一刀两断，究竟何错之有？如果保住个人的“过去”之代价必须是出卖良知，我宁可选择“告别过去”。

客观、公正地评价政治人物，是每一个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笔者在写作时，本着对周恩来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的原则；即便是对“文革”浩劫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书中在揭露的同时也并没有一笔抹杀，还是肯定了他对中美和解的决策，这对日后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起了积极作用。当然，《晚年周恩来》只是一家之言，难免有不足之处。不过，这绝非“司马公”文中所说的“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晚年周恩来》是否比较客观地展示了人物和历史的复杂性，读者自有公评。不少人认为，这本书是当今大陆领袖人物传记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当下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的丁东先生最近表示：最近几年，来自海外而对大陆读者在思想深层发生影响的，首推高文谦的著作（54）。

其实，象“司马公”这样官方史家的御用文人实在没有资格就“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说三道四。因为在他们话语中所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其实不过是让历史为政治服务，让民众相信中共官方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以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笔者这本书戳穿了这种谎言，揭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的老底，还了历史本来面目。如果官方史家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为何如此胆怯心虚，不敢让我的书与大陆读者见面呢？难道你们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就那么不堪一击，非要靠尽掩天下人耳目和嘴巴才能站住脚吗？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司马公”文中所谓的“客观公正”是多么虚伪的东西了。

至于“史德”问题，更不是“司马公”们有资格谈论的了。中国史家的传统是甘冒杀身之祸，秉笔直书，为历史留下见证，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司马公”们作为官方史家，占有最全面的文献资料，却把它垄断起来，按照官方的政治需要来图解历史，神化领袖人物，以此来替专制制度歌功颂德，还想求得“心之所安”，完全是自欺欺人。这样的行为居然还好意思谈论“史德”，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历史毕竟不是政治的婢女，可以任由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梳妆打扮，更何况是“文革”浩劫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首先要有做人的良知，然后才谈得上治史和论史。既然“司马公”以太史公司马迁自比，就请好自为之，莫玷污了这个名字。要知道

凡是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的文字，都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到头来难免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愿“司马公”们三思。

注释：

-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美国），2003年出版。
- (2) 出处同上，第8页、第602页。
- (3)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春秋》，1989年第1期。
- (4) 电报全文参见《晚年周恩来》第32、33页。
- (5) 参见《晚年周恩来》第32、33页。
- (6)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1），（香港）《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1期。
- (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3月），中央档案馆藏手稿。
- (8) 出处同注（6）。
- (9)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
- (10) 出处同注（6）。
- (11) 出处同注（6）。
- (12) 出处同注（6）。
- (13) 出处同注（9）。
-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13日。
- (15)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
- (16) 详见《晚年周恩来》书中第81、82页。
- (17)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2），《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2期。
- (18)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1页。
- (19) 出处同注（17）。
- (20) 出处同注（17）。
- (21) 赵炜，冷风执笔，《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 (22) 出处同注（17）。
- (23)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56—673页。
- (24) 出处同注（17）。
- (25) 出处同注（23）。
- (26) 出处同注（17）。
- (27) 详见杨成武的“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第18页。
- (28) 出处同注（17）。
- (29) 出处同注（17）。
- (30)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3），《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3期。
- (3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 (32) 出处同注（30）。
- (33) 见《晚年周恩来》，第314、315页。
- (34) 出处同注（30）。
- (35) 出处同注（30）。
- (36) 详见《晚年周恩来》第378、379页。
- (37) 这是汪东兴1973年2月7日给医疗组负责人吴阶平的电话指示，引自周恩来医疗组《补充病历记录》。

- (38) 出处同注(30)。
(39) 出处同注(30)。
(40) 吴阶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周恩来为何没能及时动手术,2004年2月。
(41) 出处同注(30)。
(42) 出处同注(30)。
(43) 出处同注(30)。
(44) 出处同注(30)。
(45) 见《晚年周恩来》第466页。
(46)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4),《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4期。
(47) 出处同上。
(48)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49) 秦九凤、高云撰文,转自《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
(50) 出处同注(46)。
(51) 出处同注(46)。
(52) 出处同注(46)。
(53) 出处同注(46)。
(54) 丁东,《我对海外中文网站的观感》,原载《议报》第171期,2004年11月。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总第87期)

~~~~~  
【史料辨析】

《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个错位的类比

· 欧阳龙门 ·

被指控为“林彪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1)在描述当时(1971年前后)的社会状况时,使用了如下的类比: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本文通过研究当时的历史材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类比,更为恰当、更为准确的类比应该是: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本文进一步认为:出现这种错位的类比,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拟者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

一、“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主要是一种安排就业的手段。(2)(3)

文革从1966年开始,进行到1968年,各行各业都陷于停滞状态,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使当时在校的中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一些地区在1968年开始动员中学生上山

下乡，虽然有些成效，但是阻力很大〔4〕。对此《人民日报》在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5〕

在当时那个对毛泽东充满“个人崇拜”的泛政治化年代，一项解决城市就业的措施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是，“上山下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把矛盾转嫁到农村、转嫁给农民、转嫁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因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诸如青少年犯罪、“走后门”等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认为自己的就业得到了解决，都千方百计地想各种办法回到城里。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失业”。

## 二、“五七干校”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送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下放劳动，以后定名为“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对此批示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5〕于是，全国各地都陆续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大都在艰苦的边远农村，集中劳动、学习，有严格的纪律，不能随意离开。有些还由军队或“工人宣传队”监督管理，所以许多亲身经历过“五七干校”的人，都将他们的经历类比为“劳改”或者“改造”。例如：

肖凤在《〈萧红传〉、我的笔名及其他》中写道：“那时候，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劳改回到北京不过几年时光。”

陈虹在《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中写道：“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

该文同时还提到：“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

何蜀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中写道：“机关干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被‘一锅端’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

高骏千在《韦君宜二三事》中写道：“这四年里，我和韦君宜在‘五七干校’一同改造，……”

## 三、结论一

基于以上简述，本文认为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到“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更恰当、更准确。事实上，虽然许多人在引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这些类比时，都是引用原文。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改用的本文的类比。例如：

刘晓波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中、郑贻春在《现代君主论》中、马怡阳在《重新评价

林彪 》中、方壶斋在《从美国总统辩论看中国政治透明 》中，都是将“上山下乡”类比为“变相失业”，将“五七干校”类比为“变相劳改”。

本文认为：并非这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而是他们认为与本文相同的类比更能说明问题。

四、结论二

现有的材料都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参与拟定者有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1）（7）。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出现这样的类比错位，与这些人的身份是相适应的。林立果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当时任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当时任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属于享有较多特权的社会精英集团，尤其是在空军的领导机关，他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比其他的社会集团都要丰富。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又不免有些狂妄；他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弊病，了解到一些民众的疾苦和怨言，所以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他们列举出了：

-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同时由于处在特权阶层的地位，他们对民间的疾苦诸如“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没有直接的、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五七一工程纪要》只不过是一份手稿，所以在表述的时候出现了本文认为的错位的类比。

注释：

（1）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五七一工程”纪要》，《华夏文摘增刊》 z k 0 2 0 9 a  
（2）《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 1 9 5 7 年 4 月 8 日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 9 6 4 年 1 月  
（4）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延安中学军训组：《协助天津延安中学革委会做好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的体会》，《人民日报》 1 9 6 8 年 7 月 2 8 日  
（5）《人民日报》编者按，《人民日报》 1 9 6 8 年 1 2 月 2 2 日  
（6）《人民日报》编者按，《人民日报》 1 9 6 8 年 1 0 月 5 日  
（7）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亡灵祭坛】

吴晗女儿之死

• 佚 名 •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天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她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吴晗被捕入狱后第二个月，妻子袁震被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次日袁震就与世长辞了。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陶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

1973年6月，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

“四人帮”一伙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

就在小彦含恨死去的半个月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吴家惟一的幸存者吴彰得悉后悲喜交加。他斟满了一杯酒，泼洒在地上，把喜讯传给父母和姐姐的冤魂，让他们从此安息。

□ 原载《作家文摘》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